

程朱理学历经了宋代的曲折发展后，在元朝成为官方正统学说，明代重塑了理学“文化一统”的核心，确立了天下独尊的地位。明建国伊始，朱元璋便大力倡导儒家思想，通过科举考试、官员选拔、学校教育、社会教化等措施，使得程朱理学思想广泛地施行到社会各个阶层和各民族之间，得到官绅士大夫、基层里甲和宗族社会的普遍认同，增进他们之间的思想一统和文化认同，形成了“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宗族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由于社会文化在官方主导下日新统一，各阶层、各民族主动学习和吸收儒家文化，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交融也日益深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也得到巩固并不断发展。

理学独尊与文化一统

程朱理学发端于北宋时期的周敦颐、邵雍，经张载、程颢、程颐的发展与丰富，奠定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基础。南宋时，朱熹糅合了北宋各家学说，使理学更为系统化和体系化，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因其学以“理”为核心，倡导伦理纲常、秩序遵从，是构建王朝“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它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故称之为“程朱理学”。在时代的孕育之下，经过两宋的发展，程朱理学在元朝正式确定了官方正统的地位。在元明两朝，统治者都认识到程朱理学在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方面对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上大力弘扬理学思想，以“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宗族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与基层社会的价值观念高度融为一体的新阶段。

明初，朱元璋为巩固国家的统一，继承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借鉴、吸收历朝治国的经验，废除宰相，权分六部，重组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结构。在思想文化领域强化了程朱

程朱理学与明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 彭 勇 张幼欣

理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不仅将其确定为官方正统，还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把各族人民纳入这一思想体系当中。成祖登基后，在程朱理学的官学化道路上更进一步，他倡导编纂儒学经典典章，颁布《圣学心法》。永乐十二年（1414），又命翰林院学士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以传统儒家经典为根本，主要采择程朱理学家的学说，达到“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的目的。

兴学教化与文化认同

有明一代，明朝从中央到地方大兴学校教育，宣传程朱理学，教化百姓，以儒家思想育才选官，将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推广到全国各地、各民族和社会各阶层当中。

兴学育民。明初，太祖提出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治主张，主张恢复儒家礼教，在全国各地区广泛设立各级学校，在各

民族和各阶层中推理学。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均以程朱理学为主，宣传天理纲常、礼法秩序的观念。各级官学的教学内容，多以“四书”“五经”和律令诰敕为主。乡村基层学校的教学内容，“以百家姓氏千文为首，继及经史历算之属”，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还要学习诸多礼仪。社学、蒙学以启蒙识字为主，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忠孝礼仪、纲常伦理等内容，充分体现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程朱理学教育百姓、化育万物上的功能。

明朝对边疆各族人民的教育同样重视，明太祖认为各民族虽然风俗不一，但都是可以教化的，“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夏，抚御之道，远迹无间”。因此，明初就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卫学或土司学，甚至把边远地方土司官员的孩子送到京城去学习，这样的举措，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科举之制。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人才选拔的重要制度，摆脱了魏晋以来以门第作为选官的标准，使庶族寒门也有机会进入官僚阶层。从隋唐到两宋，科举制不断发展，管理体制

越来越规范，虽然漏洞也很多，但仍然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大批的平民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步入官场。读书人的地位提高了，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了，国家的统一性增强了，时代也在不断向前发展。

通过学校的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引导，程朱理学思想不断融入到各族士人当中。各族士人投身于国家治理和地域文化建设当中，又使程朱理学得以深入到各民族基层社会中，自上而下地增进了各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同。据《开化府志》载，明崇祯年间，云南阿迷州土司普名声妻万氏，欲胁迫八寨土司龙上登反叛，龙上登怒斥道：“我本汉臣，数百年受国家厚恩，累代敌挡交南，恨无尺寸功，何忍从逆，以遗万代骂名。”

文化交融与社会整合

在兴教育民、倡行科举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发挥了强大的包容力、向心力和凝聚力。知识群体充分发挥了地方宗族的凝聚作用，明代的宗族

制度在广大基层社会中，对促进统治阶级思想观念、价值观与民间基层社会之间形成高度的上下一体，即“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明代中期的社会，越来越呈现出以理学思想为核心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以学习儒家经典为契机，在多民族交往、交流的促进下，知识、文化和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普及。统一的语言与文字，是各民族进一步交往交融的基础。程朱理学中强调的纲常伦理、礼法秩序，也充分地体现在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变迁之中。生活习俗的影响又是互相的，各民族群体在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在语言、服饰、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明显交融和趋同。

宗族组织与基层社会。儒家传统伦理和思想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宗族组织在基层社会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明清国家机构的设置，有“皇权不下县”之说，宗族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就保证了基层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统治者倡导的国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一致。

这一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基层

宗法关系建立起密切互动关系。一方面，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劲，皇权通过宗族、里甲等基层组织来管理和影响地方社会，比如明代在基层倡导推行的乡饮酒礼，就有了严格的程序和管理制度，通过里甲宗族来组织，以达到教化地方的目的。另一方面，民间组织也推动了官方管理不断完善和进步，把国家意志不断引入到地方。这一时期的宗族组织既表现为全国高度的统一性，又由于疆域之辽阔、民族成分之复杂等因素，呈现出强烈的自我发展态势和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可以说，以程朱理学等儒家礼教为中心建立的宗族制度，维系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广大基层社会，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文化交流逐渐深入，在不断的文化交往与交融中，推进了各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并自下而上的巩固了对明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所以，明代在官方文化政策的推行与基层社会文化认同逐渐强化的过程中，各民族的特色文化以程朱理学为桥梁，在互相交往交流之中，交融日益深入，进一步完善并发展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基础，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清承明制”，清朝是以满族权贵为统治核心建立起的国家政权，在入关之初面对的是比明朝更为复杂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清朝统治者任用明朝时的汉族官员，大兴儒学教化，重塑程朱理学形象，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重构国家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等将国家意识形态贯彻至基层社会中，继续发挥宗族制度在基层社会的组织功能。同时，清朝统治者还结合多民族国家管理的实际需要，以各种不同手段处理蒙古、西藏、新疆、台湾等地的管理问题，经过顺、康、雍、乾四朝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共同体形成了稳定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上接1版头条）我们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全国财政支出70%以上用于民生，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4%以上，连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启动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支持改造棚户区住房4200多万套、农村危房2400多万户，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现阶段，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站在新的起点上，财政部门将牢牢把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重大原则，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我们将持续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积极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在

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基础上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持续提升治理效能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推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其中，财税体制改革蹄疾步稳、国际财经合作纵深推进，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修订出台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健全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创新建立并常态化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预算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法

治化和透明度得到提升。持续深化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初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宏观税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积极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创设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出台实施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央与地方财力配置更加合理，财政体制日益完善。深化财金领域务实合作，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成立新开发银行，支持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积极贡献。

立足现实，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站在新的起点上，财政部门将牢牢把握“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原则，着力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把我国制度优势更

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们将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命题，进一步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完善关税制度、加强多双边财经对话、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善作善成、久久为功，推进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再上新台阶。

切实提升斗争本领，全力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我们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直接考验我们的斗争勇气、战略能力、应对水平。一方面，世纪疫情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一些国家视我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对我国进行打压遏制，来自外部的风

险挑战始终存在。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矛盾风险挑战，由经济下行压力引发的经济问题、民生问题、稳定问题日益凸显，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还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这些年，我们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控制在50%以下，地方隐性债务减少1/3以上，财政状况健康、安全，为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留出足够空间。与此同时，不断强化对财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切实履行好财会监督职能，深入开展地方财经秩序专项整治、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等，有效遏制财经纪律松弛态势，推动财经纪律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历史反复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站在新的起点上，财政部门将牢牢把握“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一重大原则，加强风险预判和战略预置，切实提高攻难关、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的

能力。我们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坚决防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强化融资平台公司综合治理，在有效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同时，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紧紧围绕加大财政资金监管力度、强化各环节制约制衡等方面，出重拳、下实招，推动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更强大的制度保障。

奋起新征程，扬帆再出发。党的二十大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动员令，财政部门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上接1版二条）构建集高效农业、现代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高效服务业、未来产业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全速发展新兴产业，超前部署未来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推动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统筹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发展。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塑造产品品牌，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围绕产品与服务质量不高的突出问题，完善传统产业与新产业的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体系。推动企业精心设计、精益生产、精细服务。健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提高全面质量管理水平。围绕着产业升级、消费升级、贸易升级需求，推动高品质、高性能、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有竞争力、

有良好体验、有市场前景、绿色低碳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发展。推动以平台化、共享化、供应链化、生态体系构建的新商业模式发展。

增强创新能力。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关键技术追赶跨越。加大科教人才支撑，最大程度释放创新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产业结合自身情况，开展仿制创新、集成创新、原始创新和颠覆式创新，推动企业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国家创新系统一体化构建，推动建设政产学研用有机结合的创新生态体系。尤其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中大显身手。提升产业竞争力。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勇于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以形成国家竞争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为导向，构建有利于提升竞争力的要素条件与环境，持续提升生产率水平和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培育与打造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集团，造就具有产品出口、服务出口、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及重大工程承包能力的大型综合型企业、加快培养国际细分市场领域竞争力强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产业规划、设计、制造、建设、运营、维护各环节，推动全生命周期绿色化。开发高效率、低消耗、低排放的绿色供应链流程，降低供应链能源消耗总量；严格能耗、物耗准入门槛，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行清洁生产、绿色交通、绿色物流及绿色建筑，推进再制造工程，促进污染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并重转变。促进能源消费清洁化与清洁能源生产方式，提升新能源与清洁能

源供应比重。

提升国际资源整合能力。以全球视野和全球战略思维，经略周边，布局全球。以高度开放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吸引各方资源和要素。构建多元化国际市场，稳定扩大传统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努力发展潜力市场。将中国产业深植于世界的资源、生产、研发、设计、创新、贸易、流通、金融、运输、物流、营销、信息和知识等体系，从世界汲取能量。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重点完善五类体系

以更好的体制机制、国内外环境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处理好产业发展中多主体的关系，重点完善五类体系。

完善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政策体系。做好战略谋划与统筹，制定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我国已出台了大量产业政策，奠定了前期政策基

础，但政策仍有不少优化空间。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有科学、完整、协同的政策体系来促进，涉及财政、税收、金融、科技、创新、标准、知识产权、品牌、产业组织、中小企业、区域、土地、贸易、国际合作、环境、人力资源、安全等多个方面。

完善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市场经济体系。着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部门和地方壁垒。推动要素市场发展，提高要素流动效率。健全市场交易规则与价格机制，使交易公平，价格信号正确反映供需。加强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使市场经济成为信用经济。形成权威高效、规则合理、审慎包容、动态优化、前瞻性强的现代市场监管体系，维护市场安全和稳定运行。

完善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开放体系。有序扩大市场开放，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充分理解各国发展的关切，与各国加强沟通，消除误解，增进互信，努力构建科技突破、

产业发展、全球合作的良好局面。按照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等原则，与各国共同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发展环境。

完善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法律体系。面对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类型、不断变化的国内市场形势，错综复杂的各类市场主体关系，要通过完善保障产业安全的法律体系，着力公平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全面释放发展活力激发创新动能，推进产业升级适应结构优化，协调好各类主体关系。

完善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文化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先进文化为支撑，需要正确的义利观、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全社会倡导和树立“责任担当”“开拓进取”“平等尊重”“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绿色生态”等文化理念，充分弘扬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等伟大精神。

（作者系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研究员）